

# 臺灣殖民時期「佛教教化」與「迷信陋習」改革的推動——以曾景來（1902-1977）為中心

闕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法鼓佛學學報第 27 期 頁 105-142（民國 109 年），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27, pp. 105-142 (2020)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6889/DDJBS.202012\_(27).0004

ISSN: 1996-8000

## 摘要

日本明治維新追求國家現代化，佛教也「脫亞入歐」，崇尚科學方式研究。1895 年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從軍僧開教使來臺灣後認為，臺灣宗教充滿了「迷信」、「三教合一」、「佛道混合」之內容，對臺灣佛教的觀察，則認為「僧侶、齋友素質低落」。

以歷史事件為契機，殖民統治的宗教政策亦隨之改變或調整，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隨即進入同化與皇民化階段（1931-1945）。尤其中日戰爭伊始，配合「皇民化運動」，緊接著登場的是「寺廟整理運動」。1938 年 11 月 11 日，新竹州下「國民精神總動員參與會」在新竹市公會堂召開，揭開了新竹州「寺廟整理運動」的序幕。

本文以日本殖民佛教在臺灣的歷史及其演變為主軸，探討殖民者如何以「教化」為手段進行所謂「迷信陋習」的改革，以遂行其「現代化」目的。並透過日式臺僧曾景來（普信，1907-1977）所撰之《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一窺其大要。

# 目次

---

- 一、前言
- 二、日人對臺灣佛教的印象
  - (一) 佐佐木珍龍的《從軍實歷夢遊談》
  - (二) 橋本定幢的《再度日誌》
- 三、「西來庵事件」後的宗教調查
  - (一)「西來庵事件」
  - (二) 宗教調查的展開
  - (三)「南瀛佛教會」
- 四、曾景來的《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
  - (一) 生平
  - (二) 曾景來的「迷信陋習」改革與殖民政策
    - 1. 《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
    - 2. 殖民政策
- 五、結語

---

## 關鍵詞

殖民地、曾景來、迷信、皇民化運動、臺灣

## 一、前言

明清以降臺灣佛教充斥著「佛道不分」、「三教合一」，同時又以現世安樂、祈求靈驗為導向的庶民信仰為主。

乙未割臺，開啟日本殖民臺灣逾半世紀的統治。在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西化運動中，日本佛教各宗受「廢佛毀釋」的影響，在神道國家主義的政策下，明治政府頒布「神佛分離」令，導致寺院、佛具受破壞，僧尼被強制還俗，僅僅 5 年，傳統佛教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從 1877 年起，在以今日東京大學前身為首的數所大學，開始以實證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佛教，伴隨而來的是南條文雄（1849-1927）、高楠順次郎（1866-1945）、渡邊海旭（1872-1933）、荻原雲來（1869-1937）諸學者赴英、德、法留學，學習到歐美的實證主義學風，並將之導入日本。<sup>1</sup> 明治國家體制確立的同時，也確立了「明治佛教性格」，一是實證主義佛學之風，一是儒佛輔翼神國觀，而當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這樣的佛教性格隨著各宗佛教從軍僧來臺開教而傳入。

明治維新追求國家現代化，日本佛教也「脫亞入歐」，崇尚科學方式研究。從軍僧開教使調查臺灣宗教之後認為，臺灣宗教充滿了「迷信」、「三教合一」、「佛道混合」之內容，對臺灣佛教的觀察，則認為「僧侶、齋友素質低落」，這種論調正是「明治佛教性格」的展現。這種性格隨著大正、昭和國家主義的強化而強化。

以歷史事件為契機，殖民統治的宗教政策亦隨之改變或調整，殖民時期的臺灣佛教分為三期，即：前期（1895-1915）：探索

---

\* 收稿日期：2020/3/5；通過審核日期：2020/12/28。

<sup>1</sup> 西嶋和夫，〈日本仏教と明治維新〉，《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6:2，1998 年，頁 821-826。



與結盟、中期（1915-1931）：合作與開展、後期（1931-1945）：皇化與改造等三階段。<sup>2</sup> 第一階段（1895-1915）在「無方針政策」之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彼此尚在摸索中，直到 1915 年余清芳（1879-1915）藉神道設教的「西來庵事件」，為殖民當局帶來衝擊，致使殖民者調整原先對宗教的「無方針政策」，從展開而進入第二階段（1915-1931）宗教上的合作與開展時期；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隨即進入同化與皇民化的第三階段（1931-1945）。尤其中日戰爭伊始，配合「皇民化運動」，緊接著登場的是「寺廟整理運動」。1938 年 11 月 11 日，新竹州下「國民精神總動員參與會」在新竹市公會堂召開，州知事對與會者表示：「為了本島皇民化徹底，要如何對舊有的寺廟、齋堂等執行適切的政策？」<sup>3</sup> 揭開了新竹州「寺廟整理運動」的序幕。

本文以日本殖民佛教在臺灣的歷史及其演變為主軸，探討殖民者如何以「教化」為手段進行所謂「迷信陋習」的改革，以遂行其「現代化」目的。並透過日式臺僧曾景來（普信，1907-1977）所撰之《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一窺其大要。

過去專門針對曾景來之研究為邱敏捷的「107 年度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二十世紀臺灣佛教研究的先驅——以右堆美濃客家籍李添春、曾景來為線索之考察」。之後邱氏將報告書修改後以〈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發表於《臺灣文獻》第 70 卷第 2 期（2019 年 6 月）。

---

<sup>2</sup> 關正宗，《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年。

<sup>3</sup> 宮崎直勝，《寺廟神の昇天——台灣寺廟整理覺書》，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1942 年，頁 3。

## 二、日人對臺灣佛教的印象

### （一）佐佐木珍龍的《從軍實歷夢遊談》

在日本佛教各宗中，曹洞宗是最早來臺布教的宗派之一，明治 28（1895）年 6 月，<sup>4</sup> 佐佐木珍龍（1865-1934）隨第二師團（有說隨總督府）為布教師，由威海衛渡臺，<sup>5</sup> 同年 7 月，設布教本部於龍山寺，<sup>6</sup> 與此同時曹洞宗宗務支局亦設於寺內。<sup>7</sup>

佐佐木珍龍，千葉縣人，1865 年生；1877 年於同縣光嚴寺依龍海和尚受戒；1881 年 1 月入曹洞宗大學林；1885 年 11 月大學林畢業一個月，出任光嚴寺住持；1889 年，轉任北海道壽都町龍洞院住持；1894 年，甲午戰爭期間被任命為從軍布教師來臺；1901 年 12 月為止，在臺從事布教活動，前後六年；1903 年 3 月，返日出任新潟縣中蒲原郡橫越村大榮寺住持；<sup>8</sup> 1934 年去世。

《從軍實歷夢遊談》是佐佐木珍龍於甲午戰爭期間隨軍進入中國東北，隨後並加入接收臺灣的近衛師團來臺布教。他隨軍往來南北，最遠抵臺南，全書有他對東北及臺灣宗教的觀察。其中佐佐木的臺灣佛教印象有：

#### 一、佛道不分

「（民間寺廟）所奉之本尊也與官廟相同，皆有各式各樣的奉祀，其中以奉祀觀音最多，其次是釋迦牟尼如來，再其次為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天上聖母、城隍爺、開漳聖王等眾多崇拜。」<sup>9</sup> 佛

<sup>4</sup> 〈臺灣布教傳道一班 曹洞宗〉，《臺灣日日新報》，1898/10/6，2 版。

<sup>5</sup> 〈臺北寺院（五）／曹洞宗臺北別院〉，《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10/2/26，5 版。

<sup>6</sup> 〈臺灣布教傳道一班 曹洞宗〉，《臺灣日日新報》，2 版。

<sup>7</sup> 〈田地の寄附〉，《臺灣新報》，1896/11/18，3 版。

<sup>8</sup> 松金公正，〈日本殖民地統治初期佈教使眼中的臺灣佛教——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為中心〉，《圓光學報》3，1999 年，頁 22-23。

<sup>9</sup> 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東京：鴻盟社，1900 年，頁 38。

教寺廟混祀民間諸神，民間信仰寺廟也崇拜佛教佛菩薩，這是自古以來現象，但日本宗教研究相關人士則不以為然。

## 二、僧侶知識低下

佐佐木表示：「全盤來看，可說是有知識之僧缺乏，沒有學問。」<sup>10</sup>

## 三、不知好好坐禪

佐佐木表示：「未如我日本建立一定的修業規定，說到是否有坐禪，坐禪是有的，那麼是否看到坐禪，情況是都不知道好好坐禪……。」<sup>11</sup>

## 四、半路出家者多

佐佐木表示：「少數有知識的多是晚年僧，二十四五歲志在官場，若未能遂志者或是剃髮，或是未能獲取功名，感到人生無常而離開重要的妻子。」<sup>12</sup>

## 五、「阿彌陀佛」是口頭禪

佐佐木表示：「多半不懂經文，朝起敲鐘與木魚，敲木魚十下，扣鐘二次，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六次。並以『阿彌陀佛』打招呼，在日本，『南無阿彌陀佛』與念佛是信仰深厚的人所持誦，然而在此並非如此，成為普通用語。」<sup>13</sup>

雖佛教僧侶齋友「開道場做香花，亦僅習染明末遺風，於宗教上之真面目，殊覺似是而非」，<sup>14</sup>但殖民初期，統治者採取「無方針政策」，因此只能「道德勸說」：

本島物質方面顯著進步，輝煌燦爛足以驚人耳目，反之在精神界宗教方面，本島人迷信愈深，淫祠邪寺日益跋扈……開

<sup>10</sup> 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 48。

<sup>11</sup> 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 58。

<sup>12</sup> 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 67-68。

<sup>13</sup> 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 68。

<sup>14</sup> 〈新竹通信，宗教改革〉，《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11/30，3 版。

拓這般精神界，促其向上進步，伴隨著物質上的發達而努力，是吾人宗教家之使命也。<sup>15</sup>

日本在統治臺灣 15 年後，認為臺民宗教信仰並沒有隨著物質的富裕而改變，反而「迷信愈深」、「淫祠邪寺日益跋扈」，希望宗教家發揮影響力。殖民政府始終沒有介入時機點，直到，1915 年「西來庵事件」（也稱「礁吧呷事件」）爆發。

藉神道設教的「西來庵事件」是轉戾點，統治當局從「無方針政策」轉向「宗教調查」。

## （二）橋本定幢的《再度日誌》

1858 年，橋本定幢出生於日本三重縣多氣郡上御糸村；1868 年跟隨大淀觀福寺長譽泰定出家；1883 年任四等說教使；1895 年 10 月，與佐藤大道一起被分派到征臺軍，以從軍布教使身分來臺；1896 年 1 月，回日本向淨土宗宗務所報告在臺見聞，之後再以淨土宗軍隊慰問兼布教使的身份來臺布教，1896 年 7 月回日本。<sup>16</sup> 其後動向不明。

1895 年 10 月，橋本定幢與佐藤大道來臺後，先到臺南去拜會同宗的林彥明布教使，後接替林彥明的工作，隨軍在南部從事布教活動。1896 年 1 月，橋本回日本報告後，隨即來臺灣，以臺北為中心展開布教工作，留下《再度日誌》的布教工作紀錄。橋本隨軍南北奔波，所見臺灣佛教的印象是：<sup>17</sup>

臺僧少有持齋守戒者，多娶妻吃葷，橋本定幢的觀察則認為

---

<sup>15</sup> 〈本島の精神界〉，《臺灣日日新報》，1912/5/5，2 版。

<sup>16</sup> 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度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3，1999 年，頁 385。

<sup>17</sup> 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度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3，頁 387-403。

「土僧（案：臺僧）大概都是無學之文盲，不受一般人民的敬仰，甚至反而受他們的輕蔑。總之，佛教可說是僅存著命脈罷了。」

1896年3月10日，橋本至淡水「到龍山寺參拜。本尊為釋迦牟尼佛，面貌儼然，栩栩如生。與住持僧侶普妙溝通困難，我試著用筆談，該僧卻不識字。」

無論是佐佐木還是橋本，一致認為臺灣佛教衰微，臺僧幾乎是不識字的文盲，修行上亦頗有問題。

### 三、「西來庵事件」後的宗教調查

#### （一）「西來庵事件」

1915年「西來庵事件」的主要領導人余清芳（1897-1915），早年曾任警察（巡查捕），後因涉嫌詐欺案被迫解職，後還雖復職，但受長官歧視而離職，之後又因「不務正業、作奸犯科」被關入臺東加路蘭流浪者收容所，1911年11月釋放回臺南。<sup>18</sup> 根據警方的調查報告：

余（清芳）本居地臺南廳長治二圓里後獅庄五五一番地，假居住地臺南市府東巷三三三番地。當人曾受過多少教育，歷任巡查捕區役場書記，皆以品行不良免職。爾來結交無賴，明治三十七年曾受元鳳山廳行政戒告，毫無悔改之念。明治四十一年入二十八宿黨，加入恢復清朝秘密會社，煽動愚民，妨礙治安，同年十二月，鳳山廳將他送往臺東加路蘭收容所，強制就職，一時大形改過。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放還……（羅俊）不知何時與余清芳會，遂生出這等陰謀事件。

---

<sup>18</sup> 〈改過赦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10/26，3版。

該事件陰謀目的，在擊退住本島之日本人，謀脫日本政府羈絆。據被告等所供，此種大事，非一朝猝然可辦。顧今春以來，日支交涉事件之起，形勢險惡，若於此際舉事，最得機宜，日支縱又開戰，亦可乘人心之激昂，一氣鼓募同志，約於七月間舉事。首謀者勸誘手段，主利用本島人迷信，煽動冥頑不靈之時菜人等，結合黨員……。<sup>19</sup>

余清芳等以臺南市西來庵為聯絡處，原本預計 7 月起事，因事跡洩漏而提早，特別是齋堂齋友被捲入。這使得與余清芳接觸最早的齋教報恩堂堂主陳耀文必須藉著成立「宗教會」自清、自保。在此情況下，1915 年 10 月，臺南報恩堂先天派領導陳耀文與曹洞宗僧倡議籌組「佛教統一會」：

本島佛教萎靡不振，而廟堂之中，又多迷信，漸失本來面目，是於社會上大有關係也。近者督府有約束寺廟之議。現已派人員調查，於是臺南市報恩堂陳耀文居士，乃與曹洞宗今西、水尾兩禪師，籌設佛教統一會，以謀革新。<sup>20</sup>

報恩堂為臺灣「先天教之始」，<sup>21</sup> 為了自清而倡議「佛教統一會」，上引文中提到「派人員調查」，當指丸井圭治郎（1870-1934）受總督府委託所進行的全臺宗教調查。

「西來庵事件」對殖民統治者是重大衝擊，在主事者余清芳被捕後送臨時法庭審理的被告有 1957 名，其中遭到起訴的有 1413

---

<sup>19</sup> 〈陰謀事件內情〉，《臺灣日日新報》，1915/7/17，6 版；〈陰謀事件內情（續）〉，《臺灣日日新報》，1915/7/18，6 版。

<sup>20</sup> 〈佛教統一會之進行〉，《臺灣日日新報》，1915/10/19，6 版。

<sup>21</sup> 徐壽，〈報恩齋堂〉，《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臺南：國清寫真館，1932 年，頁 54。

人，而被判處死刑者高達 866 人；江定（1866-1916）被騙出降後，總督府藉口維持「國家威信」，逮捕出降者 321 人送臺南地方法院審理，被判死刑者 51 人。<sup>22</sup> 而位於臺南市的西來庵，在事件弭平後的同年 9、10 月間拆毀遷移，一部分廟地充作元會境街派出所，所有神像焚燬，部分法器移轉岳帝廟使用，<sup>23</sup> 遷建於亭仔腳街的西來庵成為「臺南第一公學校附屬夜學會」，<sup>24</sup> 自此打著「宗教神諭」旗號的抗日運動，由於慘遭殺戮的「西來庵事件」相關人士頗眾，自此未再出現。

## （二）宗教調查的展開

為了掌握臺民的宗教信仰心理，總督府從而收起原先放任的宗教政策，並展開全面的宗教調查。

1915 年 11 月 2 日起一連三天，總督府召開「全島宗教會議」，集合全臺宗教調查主任於民政長官官邸開會，討論調查範圍、調查事項、臺帳（調查紀錄簿）樣式、宗教法令等。<sup>25</sup> 總督府的喉舌《臺灣日日新報》甚至報導此次宗教會議將為發布宗教法令作準備，並嚴厲指責臺民「迷信」：

迷信在文明國不可避免，但在知識階級則可免，況且如本島人，其弊害之甚，尤不可不慎重注意。近年頻出的陰謀事件，多是藉迷信以鞏固其決心，畢竟見其原因是基於無智也是迷信的勢力。如此次陰謀事件的策源地西來庵即是證例也。本

---

<sup>22</sup> 林衡道主編，《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 年，頁 3。

<sup>23</sup> 〈處置西來庵〉，《臺灣日日新報》，1915/9/28，6 版。

<sup>24</sup> 〈夜學會繼起〉，《臺灣日日新報》，1916/6/12，4 版。

<sup>25</sup> 〈全島宗教會議〉，《臺灣日日新報》，1915/11/4，2 版。

島這種社寺（按：神社寺廟），是不能與內地（按：日本）所謂的社寺有同一待遇。

迷信不可能絕對排除，若事屬無害，也不可強加於罪，不過像本島往往導致危險思想，必須嚴格取締，也是必然措施。像此次係極為重大之事，而其除了單是所謂的迷信之外，但其弊害及於社會風氣，是要斷然取締的。

所謂淫祠邪教荼毒世道人心之恐怖，往往在文明國亦不能保證絕無，況且是先天迷信極深的民族本島人哉。……聽說這次的會議，除了花蓮、臺東兩廳之外，全島社寺總數達七千多，實為驚人，對此採取適當的措施是緊要的問題。

又另一方面，迷信以利導之，毋寧是有效果的，本島人迷信極深，在於利導之，用力於涵養一般之敬神思想。吾人一方面在嚴格取締社寺的同時，又切望不急於利導，而裨益於社會風氣，毋寧是最有效的社寺政策。<sup>26</sup>

同（1915）年 12 月 10 日起，總督府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全臺奔波，最遠至澎湖，為調查人員進行講習。<sup>27</sup> 幾日後臺中地區首先展開宗教調查，調查規定，佛、道、耶教的僧侶、道士、乩童、廟祝、鸞生等神職人員一事歸警務課管轄，調查諸事務屬庶務課職責，有關廟宇位置、主尊、管理者、信徒等交廳下各公學校調查。<sup>28</sup> 由於這是殖民以來首度全面性的宗教調查，加上媒體的以放出「基於無智也是迷信的勢力」、「必須嚴格取締」，不知寺廟本身未來的命運，故而引發了恐慌，一時謠言四起，認為寺廟所附屬的公共財產將會被沒收，<sup>29</sup> 為此總調查主任丸井圭治郎還

---

<sup>26</sup> 〈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15/11/8，1 版。

<sup>27</sup> 〈宗教調查と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15/12/12，3 版。

<sup>28</sup> 〈臺中通信：宗教調查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15/12/15，5 版。

<sup>29</sup> 〈臺中通信：宗教調查與民情〉，《臺灣日日新報》，1916/3/5，2 版。



特別出面說明：

向來本島宗教大體惟稱儒、道、釋三門，而佛教一邊，則另有特別性質之一派，如神明會、祖公會，皆組織特別宗教的團體。又全島三教多混淆總無確立純然教義，此於宗教上雖無認為弊害，督府對於此等宗教，雖不欲驟加改革，然憶內地數十年前，神佛亦為混淆奉祀，維新之際，一體嚴禁，今教義曖昧之宗教，已不見流布。此非干涉人民信仰，只為條理其亂脈耳。督府尊重信教自由，對於忠良臣民，信奉神佛，亦決不為置喙，惟愚人有迷惑于淫祠邪教，陷於不測之災者則救之。但其所以救之、整理之，與夫監督之，則不可不知其內容。且由學術上見之，其有此項宗教，亦不可不充分研核。茲故開手詳查，以資洞悉。惟臺人每于此項調查宗旨，有所誤解，懷抱起杞，如此誠為可憐……。<sup>30</sup>

丸井的口氣雖然和緩許多，但於臺民「迷惑于淫祠邪教」者，是要「救之、整理之、監督之」。「西來庵事件」落幕後，隨即展開「開手詳查，以資洞悉」。

汗牛充棟的《寺廟臺帳》最後在 1919 年 3 月，由總督府出版《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其調查情況根據丸井圭治郎的回憶：

宗教調查始於大正四年十月至〔大正〕五年三月間，由當時十分急促，以未能收到預定成績，更從〔大正〕五年四月起，預定以一年的時間，囑託各廳之公學校教員及警察官吏進行調查，由於未統一記述〔宗教〕事項取捨之精略，離所預期

---

<sup>30</sup> 〈宗教調查進步〉，《臺灣日日新報》，1915/12/30，3 版。

目標尚遠，是以〔大正〕六年九月更印刷〈關於調查記載實例〉分送各廳，讓各廳宗教事務辦事員為主來擔任〔調查〕之，即在〔大正〕六、七年度之交大體完成，大正七年度內依序提出臺帳及調查書，其容量累積，實達十三間之高，短時間內欲通覽，實非容易之事，焚膏繼晷努力尚且不能及。<sup>31</sup>

一方面是調查資料過於龐大，要在短時間吸收、分析實有困難；二方面由於類似余清芳藉宗教名義起事之抗日事件不再，透過這批龐大的調查資料輔政，可能必須等到 1921 年總督府主導的「南瀛佛教會」成立後。雖然如此，以「西來庵事件」為契機，兩年多的時間完成全臺寺廟、齋堂調查，其所完成的各地《寺廟臺帳》，成為今日研究臺灣宗教不可或缺的史料。

隨著針對「西來庵事件」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在 1919 年 3 月的完成，總督府社寺課課長丸井圭治郎，在〈序論〉的開宗明義說：

臺灣人素來無知，奉偶像早晚禮拜，其之愚雖看似實堪憐，但若以其確信此為給予福利之神，也是自己安心歸依之所託這點來看，主觀上以此應可認定對其神的信仰，如斯多神的、天然的、幼稚的宗教信仰，在現世實利上不過是一時的，故相對於佛教或基督教一神的、泛神的、不易的宗教信仰，而稱之為迷信。<sup>32</sup>

丸井認為多神的、天然的、幼稚的宗教信仰，以及追求在現世利益的宗教可稱之為「迷信」，一方面設立教育機構提升僧侶、

---

<sup>31</sup> 丸井圭治郎，〈辨言〉，《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19 年，頁 1。

<sup>32</sup> 丸井圭治郎，〈序論〉，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頁 2。

齋友素質，一方面則設立教會組織聯絡。其中教育機構於 1916 年分別由臨濟宗成立「鎮南學林」及曹洞宗成立「佛教中學林」。<sup>33</sup>

不過，此次全面的宗教調查，除了對涉入「西來庵事件」的齋堂寺廟宗教人士進行偵訊，而導致部分齋堂香火受到衝擊，如 1929 年增田福太郎調查元光寺時，他曾表示：「大正四年七月臺南事件爆發時，相傳有相關匪徒藏匿本堂，警察取締極為嚴密的結果，各地信徒考慮萬一，在該事件落幕為止，幾乎成無香客的狀態。其後雖黑白清楚，但香客不如從前……。」<sup>34</sup> 而《新竹州獅頭山寺廟資料》也記載：「本堂過去『噍吧哖事件』爆發時，流傳企圖與匪徒機脈相通的企圖。……在警察嚴厲取締的結果，各地的信徒考慮萬一，一時頓挫。事件落幕後，幾乎到了沒有信徒的情況，在當局充分調查的結果，信徒再度聚集，但不如從前。」<sup>35</sup>

由於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我們並不清楚一時受到影響的寺廟齋堂有多少，但是，誠如上述，被牽涉的寺廟、齋堂事後的香火及信徒減少，當屬必然之事。

### （三）「南瀛佛教會」

1921 年 2 月，總督府委由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在初與本土佛、齋教人士共議，談到「南瀛佛教會」創立旨趣說：

---

<sup>33</sup> 關正宗，《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年，頁 138-156。

<sup>34</sup> 增田福太郎，〈南島寺廟探訪記〉，增田福太郎輯，《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亞法秩序說》，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再版，頁 278。

<sup>35</sup> 作者不詳，《新竹州獅頭山寺廟資料》（臺帳番號 1）。本資料為臺北縣八里國小教師、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蔡淑貞訪苗栗峨眉耆老蘇錦榮老先生所得，出版及發行年代不明，但從本資料最後年代有「昭和 7 年」字樣，判斷應成書於昭和 7（1932）年之後，因所有資料為新竹州獅頭山寺廟，故以《新竹州獅頭山寺廟資料》稱之。

本島沒有教育固有本島人僧侶及齋友之教育機關，近來曹洞宗、臨濟宗及淨土宗設立學林努力於本島人僧侶及齋友之子弟教養，然而皆創設日尚淺，未見成績。因此，現時多數本島人僧侶及齋友等，其智識極低，勉強止於口誦二三經卷，能作為宗教家說法布教，成為世道人心之指鍼者，實寥寥無幾，故啟發指導彼等，圖智識提升，開發因於舊來習慣之頭腦，致力佛教智識的教養，讓其獲得宗教家資格及社會地位，透過與內地佛教的聯絡，促使本島佛教振興，從宗教信仰方面來指導輔助，以助島民之心地開發，邁進同化之域。<sup>36</sup>

曹洞宗、臨濟宗雖然成立教育機構，但「設日尚淺，未見成績」，總督府於是另起爐灶，集合全臺有影響力之僧侶、齋友，組織教會以提升教化，以免重蹈「迷信」衍生之不良影響。

1921年2月初及同月23日，召集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江善慧、臺北觀音山凌雲寺沈本圓共議，接著商之以臺北附近之僧侶、齋友，舉行協議會。同年2月26日，於艋舺龍山寺前艋舺俱樂部集會，隨即推薦臺北州下江善慧、沈本圓、陳火、黃監為創立委員。<sup>37</sup>

「南瀛佛教會」會所本部設於總督府內務局社寺課內，地方亦設立支部，目的在「涵養會員德智，與內地佛教聯絡，以圖佛教振興，開發島民之心地，時時開講習會、研究會及講演會，又調查宗教所關重要事項，及發刊機關雜誌」。<sup>38</sup>

1921年4月，「南瀛佛教會」成立，<sup>39</sup> 丸井圭治郎以「藉由

---

<sup>36</sup> 曾景來，〈創刊十週年に因み教界の變遷を回顧す〉，《南瀛佛教》11:7，1933年，頁15。

<sup>37</sup> 作者不詳，〈南瀛佛教會之沿革〉，《南瀛佛教會會報》1:1，1923年，頁19-20。

<sup>38</sup> 〈南瀛佛教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1/7/4，4版。

<sup>39</sup>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年，頁71。  
1923年7月，發行《南瀛佛教會會報》；1927年1月，改名《南瀛佛教》；1940年6月26日，將「南瀛佛教會」改名為「臺灣佛教會」；1941年2月，再將《南

本島人大宗教團體的設立，能夠一新錯誤迷信，當多少可見對本島的精神界的貢獻」。<sup>40</sup> 可見「南瀛佛教會」組織之成立是在破除「迷信」，呼應「西來庵事件」的宗教調查目的。

「南瀛佛教會」成立後 3 個月，即 1921 年 7 月 3 日舉辦首屆為期三週的「南瀛佛教講習會」，<sup>41</sup> 至 1936 年 4 月 13 日起為期兩週的最後一屆（第 16 屆）講習會，在屏東東山寺舉辦。<sup>42</sup>

從 15 屆講習會起強調「皇國固有國民精神」，顯示佛教被即將來到的戰爭導引至「皇國佛教」全面深化的地步，各地佛教人士紛紛組織協贊團體，所有的「改革」無不以「皇民化」契機，進入另一個以國家主義為導向的全面且激進同化運動中。

總督府所主導的「南瀛佛教會」，自成立之初，即為「提升」僧侶、齋友之素質而發，歷屆修了講習生都被視作「以備將來臺灣佛教傳道布教之基礎」。<sup>43</sup>

南瀛佛教講習會自「九一八事變」（1931）後開始轉變，並在「七七事變」（1937）前一年，講習會嘎然而止，走向完全國家主義協力的角色，正如「皇民化運動」啟動前（1936），透過《南瀛佛教》表示：

鑑於國家當今之情勢，作興國民精神，島民一致，其國民正確生活之徹底，為本島緊要事。即明徵建國之大業，披瀝尊崇皇室之赤誠，進一步發揮皇民精神固不待言，一方面有關島民之國民化，一是期國語徹底普及；二是透過舊有寺廟對

---

瀛佛教」改名為《臺灣佛教》，並最終在 1943 年 12 月 20 日發行第 21 卷 12 號（終刊號）後正式停刊。參見江木生，〈「臺灣佛教」二十年〉，《臺灣佛教》21:12，1943 年，頁 31。

<sup>40</sup> 〈本島人の宗教を統一近く團體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21/3/13，7 版。

<sup>41</sup> 作者不詳，〈南瀛佛教會之沿革〉，《南瀛佛教會會報》1:1，頁 24。

<sup>42</sup> 〈會報雜報：第十六回南瀛佛教講習會〉，《南瀛佛教》14:3，1936 年，頁 1。

<sup>43</sup> 〈南佛幹部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5/25，6 版。

宗教進行改革；三是打破地理師、巫覡、術士及有關死靈的迷信；四是打破、改善聘金、童養媳、殯殮、哭孝等陋習；五是打破、改善婚姻、祭祀、葬儀、其他生活上的弊風等最為緊要，且是舊慣改善上最合時宜的措施。<sup>44</sup>

此一昭告是為配合 1936 年 7 月 25 日「民風作興協議會」的決議而發，比「寺廟整理運動」正式啟動幾乎早一年，這也暗示，自 1921 年「南瀛佛教會」創會以來歷經 15 年的尋求臺灣佛教乃至宗教「陋習」的改革無效，下一步將藉「皇民化運動」來破除，而南瀛佛教會暨臺灣佛教會所領導的佛教界也將扮演一定的角色。

## 四、曾景來的《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

### （一）生平

曾景來（1902-1977），高雄美濃客家人，1916 年畢業於美濃公學校，同年 11 月，曹洞宗「佛教中學林」獲准成立，表兄李添春（1899-1988）函告北上就讀，曾景來因禮基隆月眉山林德林（1890-1951）為師。<sup>45</sup>

1917 年 4 月 1 日，中學林招生開學；<sup>46</sup> 1920 年，中學林畢業

---

<sup>44</sup> 〈卷頭辭〉，《南瀛佛教》14:10，1936 年，頁 1。

<sup>45</sup> 邱敏捷，「二十世紀臺灣佛教研究的先驅——以右堆美濃客家籍李添春、曾景來為線索之考察」，「107 年度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24，<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4&PageID=40867>（2019/8/17）。另參見邱敏捷，〈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臺灣文獻》70:2，2019 年，頁 1-32。

<sup>46</sup> 〈曹洞宗中學林〉，《臺灣日日新報》，1916/11/12，6 版。其目的是「主教育本島人僧侶及齋堂齋友，使之明心見性，涵養尊皇信佛之精神，俾完成務教使及一寺住持之人格」，同時「帝國民族膨脹，南方發展之聲，積日增高，同學林更欲擴張南支南洋教線，廣大其抱負」。

後，表兄弟倆又連袂赴日本山口縣曹洞宗第四中學林多多良中學林二年就讀；<sup>47</sup> 1922 年進入「曹洞宗大學」預科；1925 年升入駒澤大學，前後四年，師事忽滑谷快天（1867-1934）；1928 年從駒澤大學畢業，畢業論文《阿含佛陀觀》，著眼於原始佛教佛陀觀的研究，讓他成為殖民時期臺灣第一位大學畢業的佛教學者。<sup>48</sup>

學成回臺的曾景來，依住於林德林所建立的臺中佛教會館，過著肉食妻帶的日式僧侶生活。<sup>49</sup>

1931 年，任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教師；1932-1940 年，以總督府「囑託」身分，任職文教局社會課，負責《南瀛佛教》的主編工作；<sup>50</sup> 1938 年 11 月，撰成《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呼應殖民統治「皇民化運動」，視本土宗教、民俗信仰為「邪教迷信」；<sup>51</sup> 1939 年 6 月，編纂《新編佛教典》再次強調「皇民化運動」佛教徒的「任務」，將佛教、齋教、民間宗教常用經典統一合編為一，方便「行持修養」；<sup>52</sup> 1939 年 2 月，日軍攻佔海南島後，曾景來「參加考試，到海南島去工作了」。<sup>53</sup> 曾景來在海南島的「工作」，其實是擔任日本佔領海南島宣傳「大東亞共榮圈」、「興亞聖戰」的喉舌刊物《瓊海潮音》的「編輯兼發行人」。<sup>54</sup>

日本戰敗後，曾景來回臺，出任 1947 年 7 月 1 日創辦的臺灣

---

<sup>47</sup>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臺北：冠芳印刷，1974 年，頁 50-51。

<sup>48</sup> 邱敏捷，「二十世紀臺灣佛教研究的先驅——以右堆美濃客家籍李添春、曾景來為線索之考察」，「107 年度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25。邱敏捷，〈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臺灣文獻》70:2，頁 1-32。

<sup>49</sup>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62-63。

<sup>50</sup> 邱敏捷，「二十世紀臺灣佛教研究的先驅——以右堆美濃客家籍李添春、曾景來為線索之考察」，「107 年度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26。邱敏捷，〈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臺灣文獻》70:2，頁 1-32。

<sup>51</sup> 石黑魯平，序辭，《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1938 年，頁 3。

<sup>52</sup> 曾景來，凡例，《新編佛教聖典》，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1939 年。

<sup>53</sup>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62。

<sup>54</sup> 曾景來編，版權頁，《瓊海潮音》3:1，1942 年。

佛教界的第一份刊物——《臺灣佛教》之主編；<sup>55</sup> 1948 年，花蓮東淨寺住持普欽法師（1893-1971），函邀同門曾景來到寺協助創辦義學，然未獲政府許可，普欽「因念世事變幻之無常苦空」，乃將東淨寺住持讓與曾景來，遽然引退休養。<sup>56</sup>

曾景來之後專心中日禪宗研究，1967 年 6 月出版《中國禪祖師傳》；<sup>57</sup> 1971 年 12 月，曾景來撰成《寒山詩解》；<sup>58</sup> 1973 年，曾景來視察美國，回途經過日本，住東京一個月，蒐集禪宗史料數十種，特選日本三百餘名禪僧，內容「注重中日禪宗交涉史、禪僧的出家受戒、行腳遊方、尋師訪道、精煉苦修」，並稱「日本禪宗史，就是中國禪宗史的延長」，從而撰成《日本禪僧涅槃記》（上、下冊），1974 年 10 月於佛光出版社出版。<sup>59</sup>

曾景來的著作在戰前有《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與《新編佛教聖典》，在戰後則有《中國禪祖師傳》與《日本禪僧涅槃記》，其他文章則散見於《南瀛佛教》、《臺灣佛教》（戰前與戰後），他的學術成就尚待進一步發掘，而其生平竟未留下完整的資料，自 1948 年起住持花蓮東淨寺外，也長期擔任花蓮縣佛教支會理事長，戰後極為低調，曾接受曾景來著作出版的星雲法師表示：「曾普信居士在日據時代，已出家，是屬日式的僧人；臺灣光復後，成為中國佛教的居士，但還是沿用靈泉寺法派的『普』字號，法名為『普信』。所以他的身分是介於僧俗之間。他看到我們這些後輩的

---

<sup>55</sup> 〈編輯後記〉，《臺灣佛教》1，1947 年，頁 24。

<sup>56</sup> 釋修嚴，〈花蓮市化道寺<sup>上</sup>普<sup>下</sup>欽上人事略〉，普欽老和尚治喪委員會（訃文），1971 年。

<sup>57</sup> 曾景來，《中國禪祖師傳》，花蓮：華光書局，1967 年。

<sup>58</sup> 曾普信，〈自序〉，《中國禪祖師傳》，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5 年，無標頁碼。

<sup>59</sup> 曾普信，〈自序〉，《日本禪僧涅槃記（上）》，高雄：佛光文化，1974 年，頁 1。



年輕法師，都自稱弟子。」<sup>60</sup>

又，他曾寫信給星雲法師說：「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後變成日本的殖民地，我們不得已要過著殖民的生活……現在臺灣光復了，我們可以回到中國文化裡，雖沒有資格再稱為和尚、比丘，但是能做一個中國佛教的正信居士，也不禁感到萬分的榮幸。」<sup>61</sup>顯示他在戰後的低調，也承認自己「居士」的身分而不再是「和尚」。

## （二）曾景來的「迷信陋習」改革與殖民政策

以改善「陋習」為名的打破舊慣信仰之運動，約始於 1935 年，在中日關係逐漸緊張，戰爭氣氛漸高的情況下，影響到了臺灣的殖民統治政策，並隨著「皇民奉公會」的誕生，在「皇民化運動」的名義下，而進行了臺灣住民諸習慣日本化的運動。<sup>62</sup>

此時的曾景來正以「囑託」的名義投身於總督府相關宗教調查與改革的設計，他表示「吾人敢於時局下著手臺灣宗教與迷信陋習再檢討的原因，是體察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趣旨，為一新風潮，一則促使舊來宗教家與民眾反省，一則資市街庄部落教化委員暨內地宗教家與一般教導者參考，且望一助民間信仰研究。」<sup>63</sup>也就是說，《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的出版是配合「時局」暨「精神總動員運動」而誕生。

中日戰爭爆發與「精神總動員運動」的開展，加速了「皇民

---

<sup>60</sup> 〈曾普信〉，《人間福報》電子版，2018/2/4，<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499966>（2019/8/18）。

<sup>61</sup> 〈曾普信〉，《人間福報》電子版，2018/2/4，<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499966>（2019/8/18）。

<sup>62</sup> 宮本延人，《日本統治時代台灣における寺廟整理問題》，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 年，頁 15。

<sup>63</sup> 曾景來，〈自序〉，《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 2。

化」政策。「精神總動員運動」的特徵有二：<sup>64</sup>

一、以「皇民化」徹底為目標的青年、成人、婦女之總動員，從事勤勞仕奉。勤勞仕奉稱之為「國民行事訓練」，強制遙拜神宮及皇宮、參拜神社及神龕、掛國旗、奉唱君代歌。

二、強制性的「皇民化」。在「七七事變」之前的皇民化主要内容是有關於「模範部落」，即部落振興團體之設立、部落集會所及升旗臺之建設、神宮大麻之奉齋、神棚與神社之參拜、日語之普及等等。對於婚冠葬儀是圍繞在改善節約燃燒金銀紙之「陋習」上。到了「精神總動員運動」，不只是所謂「模範部落」的諸措施，還有強制性的出生嬰兒取日本名、廢除舊曆正月、勵行神前結婚、寺廟廢除等等。

## 1. 《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

1925 年尚在駒澤大學就讀的曾景來，已然認同日本佛教界對臺灣佛教的看法，同時也呼應其師林德林的「新佛教運動」：

吾鄉臺灣之現代佛教似無獨立純然之勢，半儒半道，不禪不淨，無宗無旨，真教不足，迷信有餘。一般僧侶，大都偷閑苟且，眼光偏於一邊，拘於一局，株守舊套，無膽無氣，不過安坐誦經，赴應法事而已。或有藉佛祖之看板，虛名募化，以供自身之奢侈，不顧宗門之體面，誠可悲哉！<sup>65</sup>

他認為臺灣現代佛教「真教不足，迷信有餘」，因此，大學畢業論文以《阿含的佛陀觀》為題，當有其脈絡淵源。1928 年從駒澤大學畢業返臺後，自 1931 年起即擔任佛教相關工作，尤其是

---

<sup>64</sup> 須崎慎一，《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の時代——天皇制、軍部、戦争、民眾》，東京：大月書店，1999 年，頁 353-354。

<sup>65</sup> 曾景來，〈釋迦牟尼聖哲家〉，《中道》16，1925 年，頁 6-7。

1932-1940 年，受總督府「囑託」，任職文教局社會課，主編《南瀛佛教》，此時已是「九一八事變」後一年，殖民當局以漸進式地進入「皇民化運動」初期，「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全面性的「同化運動」也全面啟動。

首版於 1938 年問世的《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一書，乃是曾景來以臺灣總督府「囑託」身分，經調查、研究而完成，可謂是在「皇民化運動」時期，一部呼應殖民當局「改善」臺灣宗教和「迷信、陋習」的專著，頗受統治者重視。

前述 1936 年 10 月號《南瀛佛教》〈卷頭辭〉曾表示在「進一步發揮皇民精神」之外，主要著眼於「透過舊有寺廟對宗教進行改革」、「打破地理師、巫覡、術士及有關死靈的迷信」、「打破、改善聘金、童養媳、殯殮、哭孝等陋習」、「打破、改善婚姻、祭祀、葬儀、其他生活上的弊風」。

當時作為《南瀛佛教》主編的曾景來，此〈卷頭辭〉應該是他撰寫的，對照起《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的章節內容依序是：臺灣の寺廟と其の對策、臺灣の怪談に就て、不思議な紅姨のはなし、臺灣の道士と其の巫術、石頭公崇拜、樹頭公崇拜、有應公崇拜、王爺公崇拜、育兒と迷信陋習、臺灣習俗と虎の信仰、金銀紙類に就て、符咒と魔術、風水と變態風俗、土地公物語、天公物語、龍山寺物語、劍潭寺物語、義民廟物語、南崁廟物語、指南宮物語、霞海城隍廟、朝天宮由來記、開元禪寺物語、附錄：臺灣寺廟總覽。可以看出彼此呼應，此時曾景來已開始撰述單獨篇章，並陸續在《社會事業友》、《臺灣時報》、《臺灣警察時報》、《臺灣婦人界》、《敬慎》、《南瀛佛教》等刊物登載。<sup>66</sup>

曾景來表示：「本書，體解國民精神總動員之趣旨，為一新風

---

<sup>66</sup> 曾景來，凡例，《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 1。

潮提倡打破改善臺灣宗教與陋習。」<sup>67</sup> 同時他也獲得殖民當局宗教相關人士的序文，即文教局長島田昌勢、前文教局長深川繁治、社會課長慶谷隆夫、臺北高校教師石黑魯平。

總督府文教局長島田昌勢（生卒年不詳，1938-1940 在任）序文道：「本島皇民化運動今自事變發生以來，急遽促進，農山漁村所有島民在皇民資質提升上，直往邁進，實勘值得慶祝之處。」<sup>68</sup>

島田認為：「為了要理解舊有之思想文化，有必要究明其信仰內容。蓋舊有之宗教沿襲多年，已深入島民生活中，成為文化原動力，雖然幼稚，但已成為本島社會活動之根源。」又說：「這次，曾景來君刊行名為《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的冊子，遍啟五百萬島民，導入日本式的精神生活上，實得機宜，亦相信是作為擔任教化之任的各位的參考書。」<sup>69</sup> 前文教局長深川繁治（1887-？，1935-1937 在任）則說：

從今日社會來看，或是從國家的立場來看，不正的東西、不好的東西，總得設法是沒錯的。因此，透過這方面的專家來判斷是必要的。

如果成為民眾生活的障礙，無法符合國家施政方針，指導其改善，或是建立適切的政策來加以處置是當然的……本島舊有宗教何其多，有謂全都不行，要全部破壞，這就會多少將已經存在的宗教情操完全奪去，不就陷入無宗教無信仰的境地了嗎？……當然，違反國體、有害治安，違反善良風俗者，是必須充分取締的……。<sup>70</sup>

---

<sup>67</sup> 曾景來，凡例，《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1。

<sup>68</sup> 島田昌勢，序，《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1。

<sup>69</sup> 島田昌勢，序，《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1。

<sup>70</sup> 深川繁治，序，《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1-2。

深川站在國家的立場，只要違反「國家施政方針」、「國體」，則必然成為取締的對象，曾景來以《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為名，羅列眾多民俗信仰，並指其為「迷信陋習」，這當然給予殖民統治者在取締上「按圖索驥」的方便。石黑魯平（1885-1956）說得更露骨：

（宗教信仰）惟神大道，當然是其根本。融合儒教、佛教、基督教的真諦而歸於惟神大道，可從我國史明知。即所有大宗教於此國土發揮其真諦，以輔佐惟神大道，以為鞏固日本人信仰之任。

……我國體——建立在惟神大道的國體，此是滋養真宗教之緣。

如此來映照我的宗教觀，何為淫祠邪寺，何為迷信錯覺，都極明快可知道。在此測驗被淘汰的邪教迷信，雖然畢竟不應繼續存在此國土，但為此所囚的人是很少的。這樣的人，從上面理論來推，說來是不生於國體的。即正教是國體，國體即正教，話語極為明瞭。

臺灣宗教問題，與本島人皇民化問題是一體兩面。總督府社會課過去就特別注意，尤其是近年加大力度的原因。而事先要必須細知本島人社會知信仰狀態，囑託曾景來君孜孜兀兀，數年間奉獻於此。<sup>71</sup>

所謂「惟神大道」乃是明治維新確立王政復古、祭政一致，恢復王朝自來的神社制度，展開神祇官復興運動，一舉將神道國家化，其他宗教只能是站在從屬、輔佐的立場。石黑的宗教觀認為，凡是有違國體——惟神大道的宗教都是邪教迷信，也不配生

---

<sup>71</sup> 石黑魯平，序，《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1-4。

活在這片土地上。

石黑最後更稱讚與他有學弟關係的曾景來是「活在日本宗教家的真價值中，不正是為日本無上的國體而生嗎？誠然，我看出他一家是皇民化之典型。作為曾君一身的願想，又受官方委託，在本島人皇民化及其宗教問題上奉公路上邁進，絕非偶然……。」<sup>72</sup>

曾景來於「皇民化運動」中投身於打破臺灣宗教之「迷信陋習」，不僅僅是針對民俗信仰或傳統宗教，某個程度也包括佛教。日式僧侶出身的曾景來，早在 1931 年他擔任曹洞宗布教師時就曾以十點來批判佛教及僧侶：<sup>73</sup>

#### 一、所謂寺院？

「寺院之中既無足以被視為寺院的制度，也無堪能統理大眾之住職」、「集熱誠信徒的淨財所建設，結果卻淪為如此不名譽的場所」。

#### 二、住職方丈之安逸

「今日之住職、方丈們卻是貧乏過度而安逸有餘」、「方丈無暇顧及佛作佛行，只管自己的利益，每日三餐也講究排場」。

#### 三、僧伽教育的缺陷

「佛教徒本當是人天教師，如今反而淪為無學、無教養，對於佛教為何物一無所知者不在少數，如此實在不堪作為指導者」、「現在本島各寺院之中，幾乎也有僧伽教育機構的設立，偶而看見○○佛學院、○○佛教研究會之類的設施，然而那只不過是個招牌，並無實績可見」。

#### 四、專營葬禮法事的佛教

「缺乏學識與人格的僧侶，並不具備教導民眾的能力」、「通常大多只是從事葬禮和做些功德等法要而已；而其中又有些人將

---

<sup>72</sup> 石黑魯平，序，《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 4-5。

<sup>73</sup> 曾景來，〈臺灣寺院管見〉，《南瀛佛教》9:3，1931 年，頁 13-18。

法要加以商業化，因而盡做些與佛教無多大關係的事，反而變成了鼓吹迷信的行為」。

#### 五、僧伽信仰的謬誤

「現今很多僧侶，不僅缺乏正確信仰，反而頻頻在民間進行迷信的鼓吹，藉以迎合反教的行為」、「佛教徒濫用外典，禮拜淫神、邪神，因而使得佛教更形混亂、複雜」。

#### 六、山林佛教

「社會在進展之中，不得不伴隨著佛教的發展，有時佛教方面腳步稍遲，而不免成為舊佛教、退化的佛教」、「代本應作為社會教化機構的寺院，卻不建設在都市，而多半是建在山間僻地之中，此對於現代生活而言，實在是一大矛盾」。

#### 七、雲水生活之放縱

「寺院之中所謂的法規、規律幾乎全然未能付諸實行，也可以說缺乏程度相當的指導者」、「寺院恰如無政府狀態的國家，也因而雲水生活變成自由隨便，任性成為習慣，終至僧侶變成怠惰者，墮落於放縱生活之中」。

#### 八、神佛混合

「相對於事奉雜神者而言，信仰一佛的才是正信者，雜信乃是信者不誠與無智的表現」、「今台灣一般的信仰，卻是神佛混合的多神原始信仰，因此整理改革臺灣佛教，鼓吹最初之一佛（釋尊）信仰實乃當務之急」。

#### 九、授戒制度的泛濫

「本島的師僧，卻是太過份不負責任，太過於草率，實在是亂發而喪失根本精神的戒法，豈非等於在廉價出售嗣法？」、「目前在臺灣剃度、授戒實在非常泛濫，若不早作改革，想來本島佛教之進展必不可期」。

#### 十、教徒思想之變化

「本島佛教徒對於佛教並無正確之理解，因此釋尊之聖意幾乎完全遭受曲解，如此反而成為毒化佛教的原因」、「一般皆以僧侶乃是葬禮的工作人員，代表民眾向神佛祈願，或是驅除不淨之鬼魔的人」、「僧侶之中也有信者、無信者，總以為佛教思想就是抱持厭世觀的，而且這種想法是持續一以貫之的」。

曾景來觀察到臺灣佛寺說：「僧侶所建是純粹的佛寺，作為修行道場。民眾所建的多與僧侶無關，大概是禮拜機構，俗稱施主廟，非常道教化，如稱為觀音堂、佛祖廟、彌陀寺、祖師廟等等。」<sup>74</sup>對於民眾參拜這些舊慣寺廟，他認為「主要是祈福邀利，只是單純根據習慣參拜，不是全然為禮拜而去，因為去寺廟也是一種娛樂。」<sup>75</sup>

從以上時點來看，這時涉及明清以來中國佛教的「傳統」，如經懺佛教、山林佛教、僧侶無知與教育養成、消極悲觀與無戒無修、佛道混合等總總問題，這些也是民國時期大陸佛教所面對的議題。

另外，曾景來也把齋教列入與佛教有關須改革的對象：「還有齋教所稱之齋堂，是由齋友所建齋教建築物，非常道教化，以菩薩為本尊，奉祀神仙。在家與出家有別，與僧侶行同樣的儀式、修行，相對佛寺的五十多座，齋堂有二百三十六座。」<sup>76</sup>因此，在繼《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出版後一年不到，1939年6月又出版《新編佛教聖典》一書，將齋教與佛教常用經典簡化編成一體，以配合「皇民化運動」進程。

## 2. 殖民政策

---

<sup>74</sup> 曾景來，《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7-8。

<sup>75</sup> 曾景來，《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2。

<sup>76</sup> 曾景來，《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頁8。



中日戰爭爆發後，配合「皇民化運動」，緊接著登場的是「寺廟整理運動」。1938年11月11日，新竹州下「國民精神總動員參與會」在新竹市公會堂召開，州知事對與會者表示：「為了本島皇民化徹底，要如何對舊有的寺廟、齋堂等執行適切的政策？」<sup>77</sup> 據此而揭開了新竹州「寺廟整理運動」序幕，迅速席捲全臺。

從1937年「皇民化運動」正式啟動，至1945年日本戰敗止，殖民統治者總共推動與宗教有關的活動有「寺廟整理運動」（1938），以及伴隨而來的「一街庄一寺院運動」、「神佛升天運動」。

1938年5月，殖民統治的喉舌《臺灣日日新報》以社論的形式說明提出「寺廟整理」的原因：

現在總督府臺帳（寺廟名簿）所載的寺廟總數有二千六百九十六座，此外未登錄的小祠堂約七千座，合計約一萬又七百座，分布在全島約三百個村鎮。即一村鎮存在著大小三十座以上的寺廟。內地神社數，平均在各鄉鎮村有九座強，尚且都有過多的議論，而臺灣鄉鎮村有三十座以上〔寺廟〕，當然依序必須整理。尤其是寺廟，不用說是本島人信仰的據點，安心立命的所在，其在過去有很清楚的有意義存在。但是，在時勢上，看到非單方面推移的今日，以寺廟為中心的信仰生活，大體呈現了助長迷信與陋習的溫床之觀，毋寧成為妨礙本島教化及皇民化運動，也是實情。即一方面深感必須在排除迷信與陋習，營造出合理文化生活的同時，另一方面漸次地從舊信仰脫離，轉移至神社信仰、皇民信仰。<sup>78</sup>

內容指出臺灣寺廟「助長迷信與陋習的溫床」、「妨礙本島教

<sup>77</sup> 宮崎直勝，《寺廟神の昇天——台灣寺廟整理覚書》，頁3。

<sup>78</sup> 作者不詳，〈社説：事變下の臺灣と寺廟整理——信仰の革新機運を善導せよ〉，《臺灣日日新報》，1938/5/18，5版。

化及皇民化運動」，藉此運動「從舊信仰脫離，轉移至神社信仰、皇民信仰」，此一社論表明了總督府的立場，同時也正式宣告「寺廟整理運動」的全面展開。

「寺廟整理運動」開始後，緊接著是「一街庄一寺院運動」，如中壢郡於 1938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壢公會堂召「寺廟整頓委員會」，會中決議郡下寺廟整頓綱要，中壢、平鎮、楊梅、新屋、觀音地方僅留一座寺廟合祀，其餘全廢，中壢元化院、平鎮湧光堂、楊梅麟鳳宮三座齋堂則改為日本佛教寺院、布教所（並與其它齋堂合併）。<sup>79</sup>

「一街庄一寺院運動」又導致「神佛升天運動」，如中壢郡中壢街大崙村的三官廟的神像，因為全是泥塑，難以搬運，所以必須當場砸爛就地「升天」，負責此一任務的是青年團指揮，大崙公學校張訓導，廟前聚集大批人潮，供奉三官大帝各五尺高的神像「升天」時先念〈啟白文〉：「諸神其體非生非滅，靈感不滅，雖神通妙用，存於色空之外，稱神言佛俱是如如，餓鬼之神現餓鬼之身，人間菩薩現人間之身，為給眾導……。」接著就開始砸三官大帝，瞬間泥像化為灰燼，張訓導甚至上去踩踏神像的頭部，將寺廟提燈用的燈籠放火燒掉。<sup>80</sup>

在「寺廟整理運動」中壢郡擬定整頓寺廟之理由主要有五大點：<sup>81</sup>

- 一、寺廟信仰阻礙本島文化之提升。
- 二、寺廟信仰違背國民精神。

<sup>79</sup> 宮本延人著，釋慧岳譯，〈關於中壢郡下之寺廟整理〉，《臺灣宗教研究通訊》1，2001 年，頁 105-113。

<sup>80</sup> 宮崎直勝，《寺廟神の昇天——台灣寺廟整理覚書》，頁 40-44。

<sup>81</sup> 宮崎直勝，〈中壢郡の寺廟を語る〉，《新竹州時報》20，1939 年，頁 55-56。另見宮本延人著，釋慧岳譯，〈關於中壢郡下之寺廟整理〉，《臺灣宗教研究通訊》1，頁 108-109。中壢郡祭祀聯盟編，《郡下に於ける寺廟整理に就いて》，中壢：中壢郡祭祀聯盟，1938 年。

三、寺廟信仰阻礙健全的社會思想之涵養。

四、從寺廟經營現狀所見，其有關財務管理、收益分配、取得等常引起糾紛的事例不少。

五、寺廟經營經營上之收益果實剩餘金，自來有支出於教化慈善事業等之慣例。

其中在第二點「寺廟信仰違背國民精神」，所謂「國民」指的就是「日本國民」，「皇民化運動」，為的就是徹底的「去中國化」，關於寺廟如何違反國民精神，文章說：

寺廟信仰其起源因具有中華民族的信仰心，在部分信仰中，在祭神其他點上，被認為以中國作為本土，像是包括視其為祖國的內容。因此，例如日常的語言、生活的方式，即使如何的日本化，囿於舊慣宗教作為生活的基調，本島大眾永遠難以擺脫中華民族的信仰，期皇民化之徹底則是不可得的。<sup>82</sup>

當然其他因素也是寺廟整理運動所要改革的項目之一，但是核心問題無可諱言的，就是寺廟的信仰太「中國化」了，所以才認為不擺脫中國的宗教信仰，則皇民化是不可得的。

曾景來的《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從宗教民俗而言，確實為臺灣留下珍貴的文化資料，然而配合「時局」、「皇民化運動」一連串同化措施，卻也毫不避諱。以破除「迷信陋習」包裝現代化殖民政策，試圖改造整個民族，正如當代日本學者所言，皇民化就是「皇國臣民化」，「皇民化政策」不同於一般帝國主義的民族壓抑政策，兩者雖然在嚴厲的壓抑上是共通，但「皇民化政策」的特徵是強制「天皇信仰」，圖在短期間奪去民族的本體

---

<sup>82</sup> 宮崎直勝，〈中壢郡の寺廟を語る〉，《新竹州時報》20，頁56。另見宮本延人著，釋慧岳譯，〈關於中壢郡下之寺廟整理〉，《臺灣宗教研究通訊》1，頁108-109。

(identity)、抹殺民族性，以同化於「大日本帝國」。<sup>83</sup>

## 五、結語

殖民時期「佛教教化」與「迷信陋習」改革的推動，從殖民初期（1895-1915）的「教化」，逐步邁向中期（1895-1931）的「同化」，最後進入後期（1931-1945）的「皇民化」。

初期「教化」以日語學習搭配日本佛教各宗布教，1915年「西來庵事件」發生後，「教化」工作則配合「同化政策」，先是於1916年先後成立「臨濟宗鎮南學林」與「曹洞宗佛教中學林」，目的在教導知識低落的「僧侶、齋友」。配合殖民當局推動破除「迷信與陋習」的曾景來即是畢業於首屆的「曹洞宗佛教中學林」。

然後，中學林教育先是1922年「鎮南學林」被「曹洞宗佛教中學林」合併時，同時改稱「曹洞宗臺灣中學林」，並取消大部分的佛學課程，僅保留每週兩堂佛學課程，而隨著1935年中學林改制臺北中學成功後，這兩堂佛學課程也隨之取消。<sup>84</sup>

在臺灣中學林取消大部分佛教課程的前一年，總督府已意識到佛教中學林教育已走上與「正規」教育接軌路線，於是透過南瀛佛教會繼續強化從「教化」至「皇民化」的進程，於是自1921年連辦16屆「南瀛佛教講習會」至1936年止。<sup>85</sup>

曾景來為日式僧侶，生於殖民時期，也長於殖民時期，深受日本佛教影響，他以《阿含佛陀觀》作為大學畢業論文，當可推知他對臺灣傳統佛教的看法。

1928年從駒澤大學畢業的曾景來，自1931年起即服務於佛教

---

<sup>83</sup> 須崎慎一，《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の時代——天皇制・軍部・戦争・民眾》，頁349。

<sup>84</sup> 作者不詳，〈臺北中學改稱後 學課以二中為標準 內地人志願者亦進入〉，《臺灣日日新報》，1935/3/13，8版。

<sup>85</sup> 闕正宗，《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臺北：博揚文化，2011年，頁222。

界；1932-1940 年，更以總督府「囑託」身分，任職文教局社會課，負責《南瀛佛教》的主編工作，這使得他直接參與了 1935 年殖民當局以改善「陋習」為名的「打破舊慣信仰運動」，這其實是日本強化殖民統治的「去中國化」的一環。

有了殖民統治者政策支撐，曾景來在陸續發表於各報章雜誌批判臺灣宗教的「迷信與陋習」之後，終於在 1938 年 11 月，編纂成《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又於隔年 6 月，編纂《新編佛教聖典》以配合「皇民化運動」。

殖民後期的曾景來，於太平洋戰爭日本佔領海南島後，擔任日本軍國主義喉舌《瓊海潮音》雜誌「編輯兼發行人」，落實日本「以華制華」的政策。戰後的他轉趨低調，避走東臺灣，專心致力於《中國禪祖師傳》（1967）與《日本禪僧涅槃記》（1974）二書的撰寫，整個戰後幾乎隱居於後山，與其他活躍殖民時期的大部分臺籍日式僧侶一樣，從「認同（殖民者）」過渡到「轉向（漢傳佛教）」。

附記：2009 年間東淨寺開始清理曾景來的遺物，首先是其生活、弘法照片被東華大學李世偉教授等收藏；2019 年 6 月，另一批手稿被賣給舊書攤，其中包括《中國禪祖師傳》、《日本禪僧涅槃記》、翻譯安井廣度《阿含經解題》，以及少量信徒往來信件等，為本人購得，再次全面研究曾景來的時機似乎已來到。

## 引用書目

### 中日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丸井圭治郎（1919）。《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
- 中壠郡祭祀聯盟編（1938）。《郡下に於ける寺廟整理に就いて》。中壠：中壠郡祭祀聯盟。
- 江木生（1943）。〈「臺灣佛教」二十年〉，《臺灣佛教》21:12，頁 26-39。
- 西嶋和夫（1998）。〈日本仏教と明治維新〉，《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6:2，頁 821-826。
- 佐佐木珍龍（1900）。《從軍實歷夢遊談》。東京：鴻盟社。
- 作者不詳（1923）。〈南瀛佛教會之沿革〉，《南瀛佛教會會報》1:1，頁 19-20。
- 作者不詳（1936）。〈會報雜報：第十六回南瀛佛教講習會〉，《南瀛佛教》14:3，頁 1。
- 作者不詳（1936）。〈卷頭辭〉，《南瀛佛教》14:10，頁 1。
- 作者不詳（1947）。〈編輯後記〉，《臺灣佛教》1，頁 24。
- 作者不詳（出版年不詳）。《新竹州獅頭山寺廟資料》（臺帳番號 1）。出版項不詳。
- 李添春著，陳國政編（1974）。《李添春教授回憶錄》。臺北：冠芳印刷。
- 松金公正（1999a）。〈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圓光佛學學報》3，頁 384-423。
- （1999b）。〈日本殖民地統治初期佈教使眼中之臺灣佛教——以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為中心〉，《圓光學報》3，頁 22-23。
- 林衡道主編（1974）。《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邱敏捷（2019）。〈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臺灣文獻》70:2，頁 1-32。
- 宮本延人（1988）。《日本統治時代台灣における寺廟整理問題》。奈良：天理教道友社。
- 宮本延人著，釋慧岳譯（2001）。〈關於中壠郡下之寺廟整理〉，《臺灣宗教研究通訊》1，頁 105-113。

- 宮崎直勝（1939）。〈中壢郡の寺廟を語る〉，《新竹州時報》20，頁 55-56。
- （1942）。《寺廟神の昇天——台灣寺廟整理覚書》。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 徐壽（1932）。《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臺南：國清寫真館。
- 曾普信（1974）。《日本禪僧涅槃記（上）》。高雄：佛光文化。
- （2015）。〈自序〉，《中國禪祖師傳》。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 曾景來（1925）。〈釋迦牟尼聖哲家〉，《中道》16，頁 6-7。
- （1931）。〈臺灣寺院管見〉，《南瀛佛教》9:3，頁 13-18。
- （1933）。〈創刊十週年に因み教界の變遷を回顧す〉，《南瀛佛教》11:7，頁 12-15。
- （1938）。《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
- （1939）。《新編佛教聖典》。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
- 編（1942）。版權頁，《瓊海潮音》3:1。
- （1967）。《中國禪祖師傳》。花蓮：華光書局。
- 須崎慎一（1999）。《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の時代——天皇制・軍部・戦争・民眾》。東京：大月書店。
- 増田福太郎（1996）。《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亞法秩序説》。臺北：南天書局。
- 蔡錦堂（1994）。《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
- 釋修嚴（1971）。〈花蓮市化道寺<sup>上</sup>普<sup>下</sup>欽上人事略〉，普欽老和尚治喪委員會（訃文）。
- 闕正宗（2010）。《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11）。《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臺北：博揚文化。
- 〈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15/11/8，1 版。
- 〈本島の精神界〉，《臺灣日日新報》，1912/5/5，2 版。
- 〈本島人の宗教を統一近く團體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21/3/13，7 版。
- 〈田地の寄附〉，《臺灣新報》，1896/11/18，3 版。

- 〈全島宗教會議〉，《臺灣日日新報》，1915/11/4，2 版。
- 〈佛教統一會之進行〉，《臺灣日日新報》，1915/10/19，6 版。
- 〈改過赦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10/26，3 版。
- 〈夜學會繼起〉，《臺灣日日新報》，1916/6/12，4 版。
- 〈宗教調査と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15/12/12，3 版。
- 〈宗教調査進歩〉，《臺灣日日新報》，1915/12/30，3 版。
- 〈社説：事變下の臺灣と寺廟整理——信仰の革新機運を善導せよ〉，《臺灣日日新報》，1938/5/18，5 版。
- 〈南佛幹部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5/25，6 版。
- 〈南瀛佛教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1/7/4，4 版。
- 〈曹洞宗中學林〉，《臺灣日日新報》，1916/11/12，6 版。
- 〈處置西來庵〉，《臺灣日日新報》，1915/9/28，6 版。
- 〈陰謀事件內情〉，《臺灣日日新報》，1915/7/17，6 版。
- 〈陰謀事件內情（續）〉，《臺灣日日新報》，1915/7/18，6 版。
- 〈新竹通信・宗教改革〉，《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11/30，3 版。
- 〈臺中通信：宗教調査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15/12/15，5 版。
- 〈臺中通信：宗教調査與民情〉，《臺灣日日新報》，1916/3/5，2 版。
- 〈臺北中學改稱後 學課以二中為標準 內地人志願者亦進入〉，《臺灣日日新報》，1935/3/13，8 版。
- 〈臺北寺院（五）／曹洞宗臺北別院〉，《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10/2/26，5 版。
- 〈臺灣布教傳道一斑 曹洞宗〉，《臺灣日日新報》，1898/10/6，2 版。
- 邱敏捷，「二十世紀臺灣佛教研究的先驅——以右堆美濃客家籍李添春、曾景來為線索之考察」，「107 年度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4&PageID=40867>（2019/8/17），頁 24。
- 〈曾普信〉，《人間福報》電子版，2018/2/4，<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499966>（2019/8/18）。



# “Buddhist Civilization” and “Superstition Reform Movement”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 The Case of Zeng Jing-lai (1902-1977)

Cheng-tsung K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College

## Abstract

While the Meiji Restoration sough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Japanese nation, Japanese Buddhists were also trying to break away from Asian traditions, favoring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fter Taiwan became a colony in 1895, Buddhist Chaplains also came to Taiwan and deemed Taiwanese religion to be characterized by “superstitions”, “Buddhism and Taoist hybridization” or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syncretism”. The quality of both Buddhist monks and lay people was the object of criticism.

Following certain historical events, the colonial religious policies were changed or revised: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of 1931, Taiwan entered the “Assimilation and Imperial Naturalization” stage (1931-1945). When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tarted the “Temple Consolidation Movement” following the “Imperialization Movement Policy”. The “National Spirit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Convention” was held at in the Hsinchu Convention Hall, initiating the Temple Consolidation Movement in the Hsinchu Prefec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Buddhist history in Taiwan to discuss how the Japanese colonizer implemented their “Superstition Reform Movement” through the so-called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Modernization. This research was also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Zeng Jing-lai’s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Superstition” (Pu Xin, 1902-1977).

## Keywords

Colony, Zeng Jing-lai, Superstition, Imperial Naturalization  
Movement, Taiwan